

“感谢一次次转折成就今天的我”

张国立参加综艺节目回忆“来时路”

张国立,1955年生于天津,在陕西长大,国家一级演员、导演、制片人。“回家之旅”究竟意味着什么?对张国立而言,这既是对既往的总结,也是再出发的新起点:“我16岁起当修铁路的工人,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下来,可是我扛下来了;然后命运又转折,我进了铁二局;之后又有机会成为南极首次科考队的一员。”夏日的夜晚,在杜甫草堂的竹林内,张国立谈到和老友见面时的感动,他说:“这是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感受。”

节目开篇,张国立回忆起小时候,在对“家”还没有明确概念的时期,他回忆:“妈妈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”。从铁二局六处宣传队到文工团,节目中,当他在自己熟悉了小半生的铁道旁徐徐前行时,内心才有了另一番解读。对于曾经的“铁路人”张国立而言,原铁二局六处宣传队和原铁二局文工团,都可以说是他演艺之路的起点。此次,回到“成长之地”的张国立,回顾了自己从铁路工人成长为文艺工作者的蜕变过程。他和老友们曾经参加修建的湘黔线龙头河大桥,如

9月13日,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推出的真人秀《走在回家的路上》开播。首期节目中,演员张国立回到了他曾经奋斗多年的地方,回忆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,再会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


图TP

今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。曾经把工地建在云彩中间,见证过从荒地到挖掘机挖下第一铲土再到火车通车的全过程,张国立不禁感叹道:“我们是见证过一个地方从荒地到可以通火车的,我们见证过铁路建设的全过程。”

青年张国立当时是一名铁路工人,后来被领导安排和当时的铁路医生一起上山采药,算是谋得了一份清

闲的工作。不过,当时贵州山区到处都是蛇类,张国立从小怕蛇,“所以看似清闲的工作,却整日胆战心惊。”

后来,张国立被调到了炊事班,负责制作面点。在节目中,张国立笑称,自己就是那个时候学的技术,到现在都会蒸馒头、做花卷。而在炊事班,他被铁路上的文艺团队发现,调用进文艺团队,开始从艺,并且逐渐进入正规的文艺演出队伍,系统学了

快板、相声、戏曲等各种形式。这才有了后来的四川人艺之旅,和更后面的影视之路。

面对从艺经历,张国立感慨了一番。原来,他进入正规的演出艺术团体面试的时候,有一位老师直接说:“怎么让这样一个外行进入到咱们内行的工作当中来了?”这种“外行”的定性,让当时的张国立非常难堪。不过,多年之后,张国立回忆往事,认为这种打击其实在当时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——让曾经停留在舒适区的自己燃起了斗志,下定决心努力在艺术道路上有所发展,才有了后面的成功。

回想起自己拼命学艺的那段时间,张国立对曾经文工团的挚友高洪顺说:“我当时就像一个海绵,突然扔到你们这样的一群人中间,我就开始学,我偷着学。”从山东快书到对口相声,张国立也坦言,正是那一时期,他从宣传队时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汲取文艺养分,内心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萌芽,而文工团里不服输的拼搏精神,至今依然影响着他,激励他不断完善自我、勇敢前行。 综禾

【声音】

“尽量不要有压力这类的杂念,我总说,对于每一个角色,我都会给它们同等重量的尊重。之前也有人问过我:不想拥有世界舞台?平心而论,作为一个演员,我当然想,那是一个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机会,会有更多人跟自己饰演的角色产生共鸣,这当然是个很有吸引力、有意义的事情。其实我演什么戏都不会把它分为过场戏和重头戏,我只会把每一天都当成最重要的一天来过。”

——电影《花木兰》从筹拍以来最让人关注的就是“谁来演”,在敲定中国演员刘亦菲后,刘亦菲这个名字就和木兰绑定在一起。近日,有媒体问她:“出演一个面向全球观众的角色,拍摄时你压力大吗?”她这样回答。

“我觉得像这样的时期,作家一定不能缺席。从2003年到现在的十几年中,几乎所有国内出现的大事我都在现场。我认为,当国家、民族、人民遇上大事时,我们作家绝对不能躲起来,必须冲在前,去记录下大事中我们国家和人民是怎么走过来的,有哪些值得我们传扬的,有哪些需要去总结的。”

——近日,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的新书《上海表情》出版。今年初,何建明因新冠肺炎疫情滞留上海。在几个月里,他通过观察和采访,记录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效的过程,并用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想,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“人民至上”的温暖底色。

“他们为了一个地名读音的确定、一个字的增删、一个义项的增删、一个新词的入例,都反复琢磨,甚至开会研讨,甚至奔波千里去听取当地人对地名的意见。粗制滥造,是不能编字典、编词典,也不配称‘典’的。”

——9月1日,“《新华字典》编纂70年暨第12版出版座谈会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。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曾经接触过《新华字典》近两版的修订,他认为,辞书表面上是一个个词条的缀合,其实它内部是一个完整的体系。辞书及其修订,是语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记录,是用辞书的方式对知识系统的整合,反映着、同时也塑造着共同体的“集体记忆”。辞书一次次修订,除了消除谬误、弥补缺失,主要任务就是跟进时代。

《此生只为守敦煌:常书鸿传》出版

“敦煌守护神”:来世还是常书鸿

“若有来生,我还是要守护敦煌。”今年,距离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先生离开,已经整整26周年。近日,新书《此生只为守敦煌:常书鸿传》出版,让人们再度忆起这位被誉为“敦煌守护神”的艺术家。

本书由著名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创作,是目前市面上比较详尽、完整、可信的常书鸿传记。为写作此书,叶文玲六次前往敦煌,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、友人建立了深厚友谊,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书中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,娓娓道来,直至常书鸿病榻前的人生回顾。

正如叶文玲在后记中所言: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、2000座彩塑、45000平方米壁画时,你没法不心灵震颤。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“守护神”的“九十春秋”后,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。

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,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。妻子陈芝秀也在法国学习雕塑,两人琴瑟和鸣。留学十年间,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博物馆收藏。虽然在巴黎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,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国。1935年秋的一天,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,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《敦煌图录》的画册,里面有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,他记在了心里。

在战火纷飞的1936年,常书鸿告别了妻女回到了祖国,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。第二年,妻女回到了国内,一家人开始了避难生活,最终到达重庆安顿下来。但常书鸿始终没有忘记敦煌,没有忘记莫高窟。1943年,常书鸿肩负着筹备“敦煌艺术研究所”的重任,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。

到了莫高窟,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。常书鸿一家住在崖壁下面的破庙里,桌、椅、床都是土堆成的,没有电,晚上点的是油灯,在滴水成冰的屋里甚至没有任何取暖设备。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,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。

常书鸿就这样在莫高窟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。他放弃了个人的艺术创作,带领研究人员清沙筑墙、整理资料、修复石窟塑像、临摹历代壁画,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但这期间的变故给了他沉重的打击——结婚二十年的妻子离开了他,不久,他又收到国民党政府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。放弃还是坚守?这是摆在常书鸿面前的难题。然而,他下决心:留在敦煌。在自身经费无着落的逆境中,常书鸿靠为人画像、变卖自己的画为莫高窟筹集资金。

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,称“九层楼”,檐角都挂着铃铎,叫做“铁马”,不



上世纪50年代,常书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。图TP

管白天黑夜,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,常书鸿听了几十年,退休后在北京安度晚年的日子里,他在窗前挂一副铃铎,梦里依稀回到敦煌。风雨人生中,常书鸿尝尽了家庭离散、横遭迫害的苦酒。但即便如此,他一生都保留着这样一种使命感: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,舍命也得保护它。

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曾说:“杭州有句话叫‘杭铁头’,爸爸经常这样说,想干的事情不管有多苦,非干到底不可。爸爸带着研究所的同仁在艰苦的环境下尽力维护,在那里修围墙、做研究,一待就是几十年。”而爸爸给她最重要的传承是“敦煌精神”,“对中国历史艺术的保护、研究,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。”几十年的坚守,常书鸿为

敦煌艺术的保护、研究和传播写下了珍贵的历史篇章。甚至有后来人感叹:在某种程度上,是常书鸿决定了今天敦煌的模样。

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:“如果有来生再到人世,你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?”常书鸿回:“如果真的还有来世,我将还是常书鸿。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。”

26年过去了,段文杰、樊锦诗、赵声良……几代莫高窟人接过“敦煌守护者”的使命棒,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不再“危机重重”,展示出了熠熠生辉的全新面貌。而常书鸿的一生,早已是敦煌往事的一部分,现在都写进了《此生只为守敦煌:常书鸿传》这本书里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